

近距离看2015 法国文学

□曹丹红



面对将巴黎比作“堕落之都”的恐怖分子,法国人则以“节日之都巴黎”来进行反驳,在群众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中,《流动的盛宴》与鲜花摆放在一起,可见《流动的盛宴》已经“成为抵抗的象征”。

与罗兰·巴特同在的一年

2015年法国影响最广泛的文学事件,无疑是对罗兰·巴特百年诞辰的纪念。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法国各地文化场所开展,持续了整整一年。据罗兰·巴特官方网站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世界发起了46项纪念活动,其中22项发生于国外,24项发生于法国本土。

作为法国文学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场所,法国国家图书馆在2015年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规模不一的活动,向这位思想上的巨人致敬。较为重大的活动包括:3月3日邀请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巴特传记作者蒂凡妮·萨莫瓦约进行了一场谈话节目;5月5日至7月26日举办了巴特手稿展;5月5日举办了主题为“罗兰·巴特及其20世纪”的晚会,邀请瑟伊出版社“Fiction & Cie”丛书主编贝尔纳·高芒、巴特研究专家埃里克·马尔蒂和蒂凡妮·萨莫瓦约,就巴特留给社会的遗产及其对个人的影响展开讨论。12月9日,卢浮宫联合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卢浮宫演播厅举办了题为“假如罗兰·巴特在2015年写作他的《神话》”的活动,邀请各界人士摹仿巴特代表作《神话》的风格写作一则“今日神话”,并在晚会上宣读。

纪念仪式显然不能遗漏各类贡献给巴特的出版物。2015年1月15日,一部献给巴特的重量级传记在瑟伊出版社“Fiction & Cie”丛书出版,拉开了罗兰·巴特纪念活动的序幕。作者为上文提到的蒂凡妮·萨莫瓦约,萨莫瓦约有幸获得巴特家人首肯,在对巴特手稿进行整理、阅读后,撰写了一部长达700多页的传记《罗兰·巴特》。传记出版后广受好评,萨莫瓦约也受多方邀约,携带这部独特的传记在世界各地宣传了罗兰·巴特的精神遗产。2015年底,《世界报》“书评”版编辑选出年度20本“心仪之书”,《罗兰·巴特》是其中之一。据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已获得这部传记的版权,中国读者也能在不久的将来有幸读到这部致敬之作。5月7日,巴特研究专家、曾主编并出版《巴特全集》的埃里

故,而是死于一场蓄意谋杀,并设置了探长雅克·巴维尔和被他“征用”的青年教师西蒙·赫尔佐克这两个人物,对巴特的神秘死因展开调查。尽管面对包括巴特本人在内的七八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小说有些许调侃揶揄的色彩,但在201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出版很难说是巧合。同时,尽管故事时间设定在巴特去世之后,但小说描绘了与巴特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小说即使不能说是致敬,至少也是某种形式的纪念。此书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先后获得FNAC小说奖和法国联盟文学奖。

法国境内的高校也举办了规模不一的研讨会或纪念会,仅在巴黎地区召开的重要研讨会及相关活动就包括:6月3日至5日巴黎胜家-波利尼亚克基金会举办了《巴特与音乐》研讨会;10月14日至23日,蓬皮杜艺术中心组织了“巴特:走出影院”系列活动,放映了介绍巴特的纪录片,呈现了巴特撰写的电影评论,讨论了巴特与电影的矛盾关系以及巴特电影美学的影响,拉丁区独立影院Champo和巴黎高师也举办了同名活动与研讨会;11月13日,巴特生前最后一个工作单位法兰西公学院举办了题为“与罗兰·巴特同在”的研讨会;12月2日至4日巴黎七大举办了包括“罗兰·巴特在今日”研讨会在内的系列活动,克里斯蒂瓦、米歇尔·德基、汪民安等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巴特百年诞辰已经过去,巴特离世也已30多年,然而各种纪念活动和出版物共同表明,巴特近半个世纪前的很多作品,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仍能启发一代代的研究者。如卢浮宫“今日神话”组织者指出的那样,“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十分活跃”。实际上,对于接触过他作品的人来说,巴特的书不只是提供了知识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符号学思想令读者能更为清醒地对待这个充斥着符号的世界,他的理论可以说摧毁并重构了一部分读者的世界观,巴特也由此晋升为思想家的行列。

文学作品继续宣扬多元文化价值

法国或许是世界上文学奖最多的国家,而格林林总总的文学奖中,颁发给外国作家作品的奖项占了不少比例。2015年刚拉开序幕,即有黎巴嫩女诗人丽塔·巴拉迪凭借《奇怪地说话》获马克斯·雅各布诗歌奖。2015年,至少有十几位来自非洲、美洲、欧洲、亚洲不同国家的作家获得不同类别的法国文学奖,较为重要的包括比利时诗人威廉·克利夫的全部作品获龚古尔诗歌奖,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尔·达乌德的《默尔索,反调查》获龚古尔首部小说奖(新人奖),黎巴嫩女作家维纳斯·古里-加塔的《驴背上的新娘》获勒诺多袖珍书奖等。再如,《世界报》“书评”版面编辑选出了2015年20本“心仪之书”,其中翻译类作品占据了2/5,包括美国作家理查德·福特的《坦诚相对》、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酒吧里来了一匹马》、意大利小说家马切洛·富瓦的《叫喊、呢喃与咆哮》、印度尼泊尔作家艾卡·柯尼阿万的《虎男》、冰岛作家埃瑞克·沃恩诺达的《邪恶》,等等。

更耐人寻味的是,2015年获法国最重要文学奖的作品很多不乏浓厚的异域色彩。首先,文学奖龚古尔奖颁给了法国作家、东方学家马蒂亚斯·埃纳尔的《指南针》。《指南针》讲述了被“东方”深深吸引的维也纳音乐学家弗朗兹·里特在某个不能入睡的夜晚,在半梦半醒之间回忆了自己的东方之旅和与东方紧紧交缠的人生之旅。正如埃纳尔本人所说:“这个旅行从维也纳开始,将我们一直带到中国海的边缘。透过弗朗兹的梦境和萨拉的流浪,我希望向一些人致敬,无论是朝向东方还是西方,他们对差异如此着迷,以致于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自己发现的语言、文化与音乐中,有时甚至在其中完全迷失了自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举动。该学院自1915年创立以来,除1954年(2部)、1975年(无获奖作品)、1999年(2部)以外,每年只评出一部获奖作品,而且获奖的基本上是法国作家。从这个角度看,2015年是双重的例外,不仅评出了两部获奖作品,而且获奖者均具有多重文化背景。获奖小说之一《特权者》的作者是出生于突尼斯、具有一半突尼斯血统的艾迪·卡杜

尔,小说以虚构的1920年代突尼斯小城纳比斯为背景,讲述了一支闯入其中的好莱坞电影摄制组对小城形形色色的居民——当地贵族、法国殖民者、年轻民族主义分子——造成的冲击、引发的冲突和导致的结果。获奖小说之二《2084:世界末日》的作者是阿尔及利亚作家布阿莱姆·桑萨尔,这部小说被称为“政治寓言小说”,虚构了一个在旧世界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受伊斯兰极端主义统治的国家“阿比斯坦”,讲述了年轻人阿提因偶然机会开始怀疑“阿比斯坦”的真正面目并决定去追寻真相的故事。

文学出版繁荣,创作题材多样

法国民意调查局在2013年曾进行过一项写作调查,发现被调查人员中有17%至少写过一部小说。在这个超过1/10人口是作家或潜在作家的国度,2015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必定不在少数。2015—2016新学年伊始,著名书评人、如今已成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的皮埃尔·阿苏利纳在博客“图书共和国”中指出,从8月中旬至10月共有589本新书出版。年轻作家不断涌现,老一辈作家还在笔耕不辍,例如2015年刚刚度过90岁大寿的法兰西学院院士端木松在去年出版了《神、事件与我们:半个世纪的纪录》,这部杂文集是作家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法国社会的总结与点评,睿智的观点、优美的文风与作品透露的乐观精神都令作品广受读者的好评。

在文坛已具稳固地位的作家中,2015年有两位作家尤其值得一提。一位是素来以桀骜不驯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文坛奇才米歇尔·维勒贝克。1月7日,也就是《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当天,维勒贝克出版了新作《屈服》。与《2084》一样,《屈服》也可以说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故事发生于2022年的法国,那一年,一位穆斯林候选人赢得大选成为法国总统,主人公——一位胸无大志的普通大学老师旁观了这个选举结果给社会造成的致命影响。《屈服》出版后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谴责作家“政治不正确”,也有人夸他富有真知灼见。英国《展望》杂志于2015年2月16日公布了世界50位思想家名单,维勒贝克名列其中。6月4日,维勒贝克获法国国家图书馆奖。另一位是同样桀骜不驯的文坛才女维吉妮·德彭特。德彭特自1993年出版惊悚悬疑的处女作《悲情城市》以来,一直关注青年一代的边缘化问题,作品因涉及性、暴力等主题备受争议。2015年,德彭特出版了《韦尔农·苏比泰克斯》(上下卷),讲述唱片商韦尔农·苏比泰克斯和他身边正在消失的世界。小说出版后斩获多项文学大奖。值得一提的是,德彭特日前已接替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成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

一方面是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文学创作的素材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作家的私人生活,自我成长与家族历史同样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2015年有两位备受关注的女作家尤其体现了这种“自我虚构”的写作传统。一位是去年出版了小说《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女作家黛尔菲娜·德·维冈,《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部带点惊悚色彩的小说讲述了与作家同名的主人公黛尔菲娜如何结识一位神秘女性L,这段亲密关系又如何“深刻地、缓慢地、肯定地暗中颠覆”主人公生活的过程。作家在其中思考了人际关系,更思考了写作本身。《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先后获法国勒诺多文学奖和法国中学生龚古尔文学奖。另一位是克里斯蒂娜·安戈(Christine Angot),她于去年出版的《不可能的恋人》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坦诚,继续挖掘了她作品的一贯主题——父母关系、父女关系、母女关系。《不可能的恋人》获2015年“十二月奖”,同时也入选《世界报》2015年20本编辑“心仪之书”行列。

以文字抵抗恐怖主义

前面提到法国文学与法国社会对文化多样性及其价值的肯定,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令法国在非理性的恐怖主义面前幸免于难:2015年对法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意味深长的是,面对极端恐怖主义,法国人民想到的武器首先是文学:年初的《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令伏尔泰的《论宽容》意外地成为书店畅销书,而11月巴塔克副院遭恐怖袭击后,人们又涌进书店去购买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据《世界报》12月25日一则报道指出,《论宽容》在2014年卖出11500本,而到2015年底统计则卖出18.5万本!11月恐怖袭击发生后,《流动的盛宴》销量提升至大约每周2.8万本,而此前这个数据一直保持在100本左右。两本书的书名很能说明问题:在言论自由遭遇威胁时,法国人想到的救兵是启蒙思想家,在没有被彻底证伪之前,伏尔泰仍还是至理名言“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拥有者;而面对叫嚣着将巴黎比作“堕落之都”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法国人则以“节日之都巴黎”(海明威作品法译名Paris est une fête)来进行反驳,在之后群众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中,《流动的盛宴》一书与蜡烛、鲜花摆放在一起,各大媒体也纷纷指出《流动的盛宴》已经“成为抵抗的象征”。另外,法国电视五台一档知名的读书类栏目“大书店”(在2016年1月7日播出的节目中统计指出,《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后,在书店出售的迎接新年的476本新书中,约有几十本书提到了这一事件,类型包括历史著作、调查报告、悼念及见证类书写、连环画等等,难怪乎美国社会学家弗格森会将法国人称作“一个文学的民族”。

我的阅读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澎湃,“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子,我写小说”至今还是令我记忆深刻,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先锋文学写作的代名词。30年过去了,我们在纪念逝去的先锋文学的辉煌时光时,回忆了那么多曾给我们带来激动的外国作家,卡夫卡、马尔克斯、乔伊斯、昆德拉……,却遗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伊格尔顿。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伊格尔顿是令当年的中国学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位西方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可在人们记忆的缝隙中被悄无声息地遗忘了。显然,这不公平。

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再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研究员,后来又分别任教于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曼彻斯特大学英美研究系的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1983年曾经出版了一本《文学理论导论》,1986年译成汉语并以《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之名在中国出版。这本在中国大陆初版只印了5千册的理论书籍,最初只是用作大学里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们学习。但后来不断扩散,一些校园外的青年批评家和青年作家也开始阅读,这本著作曾给当时渴望了解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作家、批评家带来莫大的兴奋,也带来了新鲜的文学信息。许多文学博士长长的阅读书单中,肯定会有伊格尔顿和这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8年前,我曾经粗略地读过该书,坦诚地说,没有完全看下去。读得有些七零八落,经常不住地大口喘气。如今,它被悠长的先锋文学的话题驮载而来,我禁不住再次阅读,却感到异常亲切。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将“复杂变简单”。那些挂在批评家嘴边的各种概念、各种主义以及数目繁多的理论术语,被伊格尔顿潇洒地“去神化”了,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论手术刀”细致地梳理、分类,将其格式化,通过这本书的摆渡,纷繁芜杂的西方文学理论,似乎变得清晰可记了。

伊格尔顿将20世纪西方文学的理论发展,变成了三条清晰的直线。一条是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另一条是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最后一条是精神分析理论。最为关键的是,伊格尔顿并没有在梳理线索、归纳总结之后扬长而去。这位1943年出生于英国萨芬福的爱尔兰移民家庭的严谨青年,继续负责任地加以深入分析,对这些理论的产生和变化以及问题和局限,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认真阐述。

以第一条线索为例。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这一章中,伊格尔顿讲了一个简单短小的故事:一个男孩与父亲吵架后离开了家。在中午时分,他开始步行穿过森林,结果掉进一个深坑。父亲出去寻找儿子。他向深坑地下去,然而由于黑暗,他看不见自己的儿子。这时候,太阳刚好升到正当头,以其直射的光线照亮了坑底,父亲救出儿子,高兴地对解之后,他们一起回了家。

面对这样一个故事,理论家们如何“下手”呢?伊格尔顿兴致勃勃地说,精神分析派批评家可以察觉这篇短小说中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种种明确暗示,并且指出孩子落入坑内正是他潜意识地希望的一个为了他与父亲不和而对自己的惩罚;一个人本主义批评家可能认为它是内在于人类关系中的种种围绕的动机的戏剧化;还有一类无可分割的批评家将其视为“儿子和太阳”这两个词之间的某种被扩大的但却没有什么意义的文字游戏。

但是,结构主义批评家所做的,是通过图表的方式把小说程式化。首先,第一部分“孩子与父亲吵架”,可以被改写为“低反叛高”,视作一个垂直轴。与这个垂直轴“低和高”相对的,男孩穿行树林,可以标记为“中”。落入坑内,一个低于地面的地方,表示“低”。升起的太阳,则表示“高”。阳光照入坑内在某种意义上,表示太阳屈服,俯身与“低”。假如把这个垂直轴倒转过来,也就是表示“低”反“高”。父亲和儿子的和解,也就是“低”与“高”之间的平衡。父子一起步行回家,则表示“中”,标示着合适的中间状态的完成。于是,结构主义完成了它的理论阐述。伊格尔顿通过这样细致入微的分析,向读者讲明,结构主义倾向把种种个别现象还原为某种规律。

这样的关于某种理论的理论阐述,今天读来似乎不觉新奇。但是30年前的中国文坛,对于理论饥渴、阅读饥渴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无疑就像深陷沼泽大漩涡不知所措。就像《百年孤独》的“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开篇,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国作家一样,面对伊格尔顿带有游戏娱乐色彩的理论阐释,还很严肃板正的中国批评界无疑受到颠覆性的冲击。

一本用作课堂学习的理论书籍,能够波及到校园之外,走出批评家的圈子,并得到作家们青睐,应该说这是时代的印记。当然,我们对于某种理论的认识,应该如波浪般前行,就像优秀的小诗,所有的描写都不会停顿下来,永远随着叙述的脚步前行一样。伊格尔顿的理论思想也在不断前行——他从试图将威廉姆斯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他自己所接受的天主教价值观念调和开始,随后过渡到阿尔都塞的“文本科学”,最后又走向使文学研究致力于实际的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文本知识。

是的,就像我们激动于30年前的先锋文学但不可能因为激动而再回到30年前一样。冷静回顾与激动回顾,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历史就是历史,当年的青涩与稚嫩,没有什么不好讲出来的,也只有经历稚嫩,才有成长后的超然和喜悦。

可是当下许多写作者似乎对理论研究存在误区,认为那是批评家的事。与30年前作家们对理论的重视截然不同,如今许多作家对理论研究不屑一顾,梗着脖子,骄傲地望着天,认为“我的写作就是我的理论”。如此观点倒是不能完全否认,其立场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思来虑去,我还是认为把持这种观点的人显得有些独断而封闭,缺乏“登高而招”的远视心境。

伊格尔顿说得好,敌视理论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的健忘。伊格尔顿还说,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除这种压抑并使我们的记忆住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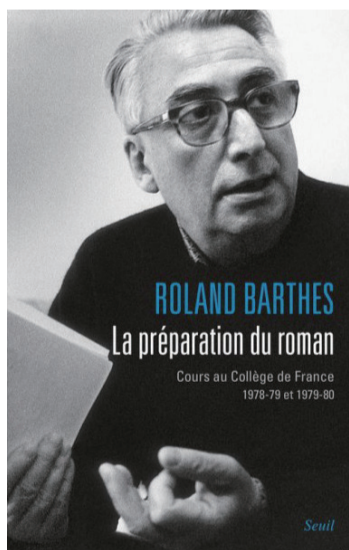
我们在写作中,多一些倾听,多一些分析,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抬起头来,才能仰望星辰。学习,绝不是让别人的马蹄践踏自己的疆域,而是更有力地夯实自己的疆域,即使“被践踏”,那也是自信力的积累和增强。

30年,倏忽之间过去了,曾经的先锋文学的浪花已经平息,或是以变异的态度重新呈现,但无论怎样,那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需要我们回忆、总结,也需要我们不断地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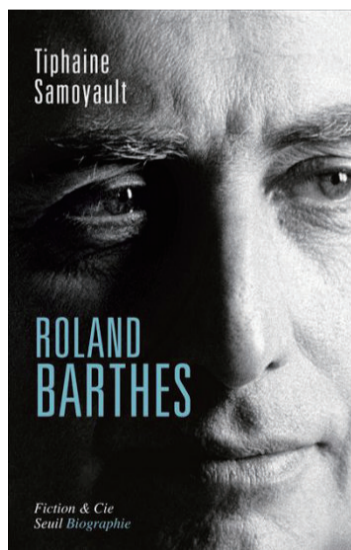
回忆先锋文学时,真的不能忘了伊格尔顿。或许,还有其他不能忘记的人。

回忆先锋文学时,不要忘了伊格尔顿

□武歌



《小说的准备》



《罗兰·巴特》

克·马尔蒂主编的文集《罗兰·巴特:影集、未版、通信、杂集》也在瑟伊出版社“Fiction & Cie”丛书出版。文集集结了巴特生前未出版的文字、照片、文件、档案、信件等。这些零碎的生活片段是对作为公众人物和知名学者的巴特的补充,呈现了或许不为普通读者甚至部分研究者所知晓的巴特形象,对于深入全面理解巴特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资料。除此之外,马克思·米罗出版社出版了马佳丽·纳特盖尔的专著《当代人罗兰·巴特》;瑟伊出版社“Fiction & Cie”丛书出版了作家尚塔尔·多马的著作《致罗兰·巴特》和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的《罗兰·巴特的友情》;蒂埃里·马尔谢出版了法国著名学者让-马利·谢弗的《致罗兰·巴特的信》等等。法国最重要的文学研究杂志《批评》也在2015年第11期出版了题为“一年的罗兰·巴特”的专号。巴特本人也有一部著作在2015年出版,那就是《小说的准备》的完整版。“小说的准备”原是巴特于1978—1979、1979—1980两学年在法兰西公学院所上公开课的主题。2003年时瑟伊出版社曾以巴特备课笔记为基础出版过一部《小说的准备》。2015年出版的这部更具权威性,因为它是巴特的上课录音为基础整理的。

除此之外,2015年还出版了一本与罗兰·巴特相关的虚构作品——作家洛朗·比奈于8月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语言的第七大功能》。这是一部以1980年罗兰·巴特之死为背景的侦探小说。小说假设巴特并非死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